

四川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生成的自然与人文背景研究

周霞¹ 陈誉源²

1.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泸州 646100

2. 北京大学 北京海淀 100000

摘要:本文以该景观为研究对象,剖析自然背景对村落布局、建筑选择及村民认知的基础作用,探讨人文背景对景观秩序与精神内涵的塑造功能。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自然环境对人文活动的制约引导与人文因素对自然景观的塑造改造,揭示了两者深度交织形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生态智慧,为当代四川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生态建设及文旅融合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四川传统村落; 文化景观; 自然背景

引言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四川凭借独特的山地气候条件与多民族交融的人文生态,孕育了丰富的传统村落资源。当前城市化进程对部分村落景观与文化造成冲击,亟需厘清其生成的自然与人文逻辑。本文从自然基础、人文塑造及两者交互关系展开研究,挖掘传统村落的生态智慧与文化基因,为其活态保护提供学理支撑。

1 自然背景对四川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影响

1.1 四川的自然地理环境

四川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生成的基础底色。四川地处我国西南腹地,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盆地周边被龙门山、邛崃山等山脉环绕,内部散布着川中丘陵,这种地形格局直接决定了传统村落的分布形态——大多依山傍水、顺势而建,避免大规模平整土地,形成了“因地制宜”的空间特征。同时,四川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长江及其支流岷江、嘉陵江等贯穿全域,河流不仅为村落提供了生产生活必需的水源,更塑造了村民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而雨季集中、湿度较大的气候特点,也间接影响了村落排水系统的设计和日常起居习惯。

1.2 自然资源的使用与空间布局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合理调配,深刻影响着四川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与景观风貌。水资源作为村落存续的核心资源,村民通过修建堰塘、水渠、水井等水利设施,实现了对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有效管理,这种水资源管理体系

不仅支撑了村落的农业灌溉和日常用水需求,更推动了村落沿水系呈线性或组团式发展,形成了“逐水而居”的空间格局。而四川丰富的山地资源则为建筑材料提供了天然供给,村民根据山地分布的木材、石材、竹子等资源,因地制宜选择建筑原料——山区多采用木材搭建穿斗式民居,丘陵地带则结合石材砌筑墙体,既降低了材料运输成本,又让建筑与山地环境自然融合^[1]。

1.3 自然景观的象征意义

自然景观是四川传统村落建筑群组周边地区的基本要素和内容存在,构成自然要素及其文化表现手法、形式等相互渗透结合的纽带,有着深刻的象征意蕴与特殊的感召力量,影响着当地民众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当然它也经常以一些特定的形象符号直接参与到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宗教信仰之中。像村落周围的古树林被称为“风水林”、河流叫做“生命之源”,寓意村落安宁、敬天爱人等,被用于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符号创设。而且,开阔的河谷、蜿蜒的群山等景观营造出来的是开放与包容的环境气氛,巍峨挺拔的大山塑造出来的是顽强不屈的精神人格,滔滔奔腾的流水滋润出的是辛勤劳作的土地情怀,那种开阔大气、坚强质朴与勤劳坚忍的生活意识也一定自觉或不自觉地内化成村民们处事的行为习惯——如围绕水源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调剂,跟着山地农耕劳作形成你来我往的邻居互助,并将之带入村落日常的行为之中,使自然景观、村落的社会关系、村落文化网络连为一体,并构成村落文化景观特有的精神内核。

2 人文背景对四川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塑造

2.1 四川传统村落的历史与文化积淀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四川省内除了汉族外还有藏族、彝族、羌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民众在此生活，也为两地人民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这些文化包含了宗教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等等，其中道教也早已经传播到四川地区的青城山以及鹤鸣山一带，并得到了传承，佛教也同样扩展到了四川地区的峨眉山以及乐山大佛等地。除此以外，还有各民族的一些本土原始信仰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发展，这也成了当下四川当地各种宗教文化盛行并且和人们生活紧密联系的重要因素。而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秦汉时期通过郡县制建立了完整的，以及空间上科学分布的行政体系，从而得以奠定了该地区一些村落雏形；后来通过中央政权强化治理，推动了农耕文明的推进和村落规整化发展。到了唐朝宋朝时，经济发展繁荣让村落规模不断扩大，交易商业繁盛也让一些村落成为重要的交流地点；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将中原地带和江南一带的文俗移入四川并融入当地文化，重塑着村落结构以及文化传播与发展面貌。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文化汇流与历史文化演变之后，四川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中虽然有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留下的痕迹，但也形成了具有“和而不同”的整体气韵^[2]。

2.2 社会结构与文化传承

村落社会结构及文化传承机制对村落空间秩序、功能布局、文化属性有着重要影响，以宗族或家族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村落社会组织是其中的核心力量。在传统的四川村落，宗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其不仅管理村落的各类公共事务，更负责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举办各项公益活动，承担宣传家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等功能。在村落之中，用来供奉先人的祠堂、宗祠是宗族权力和文化的象征所在，而在选址上也都是占据村落中最显要的位置或是地势最高处。以村落祠堂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各种房屋，按照功能大体分为院落区块和附属用房两个部分，其中院落区块是村落内部最基本的居住单元，每一户都拥有固定的围合院落，单元之间由巷道穿插，既保证了一定隐私空间，又能方便互相往还；生产空间包括耕地、林地、晒场等，多分布在村落外围或地势平坦区域，与居住空间形成合理分离；公共空间则涵盖议事坪、水井、戏台等，满足村民集会、休闲、

娱乐等多元需求。家族的伦理规范与宗族制度进一步渗透到建筑布局的细节之中，比如核心家族成员的住宅往往占据村落中心或地势较高的优越位置，院落规模更大、装饰更精美，而旁支亲属的住宅则依次向外分布，建筑规格遵循长幼尊卑的秩序；巷道的走向、大门的朝向等也往往蕴含着宗族的伦理观念与风水讲究。

2.3 传统习俗与宗教信仰

传统习俗与宗教信仰作为村民精神世界的核心组成，为四川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注入了浓厚的精神内涵，其影响既体现在静态的空间布局与建筑细节上，也融入了动态的日常仪式与生活场景之中。在空间布局方面，村落中的祭祀场所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除了核心的宗祠，土地庙、山神庙、龙王庙等小型祭祀空间遍布村落内外，这些场所往往选址于村落的风水节点，如村口、山顶、河边等，既体现了村民对自然神灵的敬畏，也形成了村落独特的空间标识。定期举行的祭祀仪式、祈福活动则让这些空间始终保持活力——春耕前的祈农仪式、秋收后的谢神活动、逢年过节的宗族祭祖等，不仅是村民表达虔诚信仰的方式，也在社区情感聚集、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更为重要的就是仪式过程当中的祭品、流程、服饰、道具等具有现场表演性质的内容，都是村落文化景观的重要部分。同时，在村落礼仪景观中宗教信仰和民俗观念大量运用到村落建筑中，建筑的门窗大多运用一些具有吉祥意味的几何图形、动植物图像，门窗的图案有“福寿绵长”、“吉祥如意”，门窗的雕刻上则运用了道教的“八卦”、佛教的“莲花”以及儒家的“圣贤”，院落朝向、格局上讲究“背山面水”、“藏风聚气”。整体看来，村落建筑不仅仅是生活居住的场所，同时也是承载并传播着文化信仰与精神寄托的物化体现^[3]。

2.4 文化与艺术表达

文化与艺术表达是村民情感和审美的直接映射，使四川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在超脱于物理的空间层面之外又多了一份审美价值与人情温厚，无论是从静态的房屋建筑装潢或器物陈设还是动态的民俗活动与日常场景中都能窥见一二。如建筑装饰而言，四川传统村落的木雕、石雕、彩绘、砖雕等各种工艺都很出色，门窗、梁柱、雀替、屋脊、墙体等皆有体现：比如雕刻题材都是山水田园、历史典故、农耕生活、花鸟鱼虫这些元素，刀工十分精致、细致入微；而村舍里的石雕一般应用在房梁和房门等地方，一般应用

在结构比较稳当结实的处所，既突出美观性也体现出一定的吉祥寓意，因此雕刻多是吉祥兽或者花纹形等富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同时也是实用性、装饰性兼具。另外则是传统的彩绘作品，明清时代的彩绘风格偏爱浓艳大色块，也多借助神话故事、地域特色的风俗民情来凸显热闹、欢快的气息，比如官帽梁底就是浓浓的喜庆氛围。最后还有器物的陈设，当空间赋予其功能意义时就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里的每一件器物都代表了当地文化和时间信息，是生产生活中实用属性的承载者，其自身的样式和工艺便构成了具有地域性以及时代性的物象存在。但是传统节庆和风俗活动会使村落景观具有生气和动态。比如：过春节时各家各户的门上都贴上了春联、挂上了红灯笼、门神；春日村落的街巷、庭院变得如此热闹，家家户户都拿出了自己的手艺，制好的米面都用来做馅蒸出各种造型花样的各式各样的棕粑。还有元宵节的灯会，舞龙舞狮等是属于广场的公共空间；再如，彝族火把节，他们会带着自家制作的火把环村巡游，围着篝火跳舞，火把光照亮黑夜，欢歌笑语温暖寒冬；还有羌族瓦尔俄足节妇女们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聚集于祭台开展祝祷祈福以及跳萨朗舞。这样的表达方式不仅增加了传统村落中物质景观所具有的文化意涵，也使村落的活动促进了村民之间的人际联系，并留下相应的文化记忆^[4]。

3 自然与人文背景的交织与相互作用

3.1 自然环境对人文活动的制约与影响

四川山地、丘陵广布且水资源分布不均的自然格局，决定了村落无法脱离自然条件盲目扩张——水资源富集的河谷平原与山间坝区，村落多呈集中式布局，形成规模较大的聚居群落；而山地丘陵区域，受地形破碎、耕地分散的限制，村落多以小型组团或散居形式分布，各组团围绕有限的耕地与水源展开布局。资源类型的差异进一步固化了发展模式：平原与河谷地区因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精耕细作模式，村落围绕农耕需求规划晒场、仓库、灌溉水渠等设施；山区则依托森林、矿产等资源，发展出林业、林下种植与手工业结合的多元模式，村落空间布局更注重交通廊道与资源采集点的连接。这种

“以资源定布局、以环境择模式”的适配关系，体现了人文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被动适应与主动契合。

3.2 人文因素对自然景观的塑造与改造

为应对山地多、平地少的自然条件，村民通过开垦梯田、修整坡地等方式改造地形，将原本不适宜耕作的山地转化为分层有序的耕地，既扩大了耕种面积，又通过梯田的阶梯结构减少水土流失，实现了对自然地形的合理利用。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村民修建堰渠、塘坝等水利设施，引导地表水流向耕地与村落，既解决了灌溉与生活用水需求，又避免了雨季洪水对村落的侵袭，让水资源在自然循环中被高效利用。同时，人文活动始终坚守“敬畏自然”的底线：村落周边的风水林、古树名木被刻意保留，既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生态作用，也承载着精神信仰；农耕活动遵循“春种秋收”的自然节律，采用轮作、休耕等方式保护土壤肥力，避免过度开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种“改造而不破坏、利用而不掠夺”的实践，让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深度融合，形成了“山中有村、村中有林、林水相依”的共生格局^[5]。

3.3 传统村落的可持续性与生态保护

传统村落的可持续性，本质上是自然条件与人文策略的动态平衡——村落布局顺应地形地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建筑采用本土材料，降低能源消耗与环境负荷；生产活动遵循自然节律，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这些实践共同构成了低干预、高适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这种传统智慧愈发凸显其当代价值：村落中“林—田—水—村”的空间结构，为现代生态村落规划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村民长期形成的生态保护习俗与资源管理机制，为区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文化支撑；而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景观形态，既保留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标识，又满足了当代人对生态宜居环境的需求。

4 结语

综上所述，四川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生成是自然与人文动态平衡的结果。自然环境决定村落的基础形态与发展模式，人文因素赋予其精神内涵与空间秩序，两者形成“相互适配、和谐共生”的逻辑。这一模式蕴含的生态与文化智慧，为当代村落保护、生态规划提供了宝贵借鉴，未来需进一步探索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唐承财,万紫微,刘蔓,等.基于多主体的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感知及提升模式[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35(02):196–202.

- [2] 王萍 , 陈楚寒 .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文化建档式保护模式研究——基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模式比较的视野 [J]. 民族学刊 ,2020,11(04):96–102,142–143.
- [3] 陈炜 , 蔡银潇 . 旅游发展对广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集群化保护的驱动机制研究 [J]. 广西社会科学 ,2021(10):64–71.
- [4] 刘劲涛 . 基于织补理论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及文化保护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市双廊村为例 [J]. 商展经济 ,2024(03):31–34.

[5] 任越 , 刘思嘉 . 基于 GIS 的传统村落文化建档式保护模型构建 [J]. 档案学研究 ,2020(04):69–74.

作者简介: 周霞 (1970.1–), 女, 汉族, 四川泸州, 本科, 副教授, 建筑设计和工程管理。

陈誉源 (1998.7–), 女, 汉族, 四川泸州, 博士研究生, 讲师, 城市治理。